

林慶彰 主編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編

林慶彰主編

第32冊

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

黃雅琦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黃雅琦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12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 32 冊）

ISBN：978-986-254-361-0（精裝）

1. 劉師培 2. 學術思想 3. 倫理學

128.1

99016468

ISBN - 978-986-2543-61-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三二冊

ISBN：978-986-254-361-0

---

## 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

---

作 者 黃雅琦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

黃雅琦 著

## 作者簡介

黃雅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實踐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學術文化，著有《救亡與啟蒙：梁啟超之儒學研究》、《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二書，編有《中國學術思想史試題解析》(上)(下)冊，並發表學術論文十數篇。

## 提 要

倫理(Ethics)，是人類社會人際關係的秩序規範。在中國，倫理是社會人心文化的核心。劉師培身逢晚清「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的時代空前巨變，他關心學術世運，對傳統倫理思想的內容、特徵、架構，甚至偏失，都有深入精到的考察，且對傳統倫理思想的改革，提出不少的新見。本文以「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為題，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本章敘述劉師培之生平及其治學傾向，概述學界研究劉師培的成果，並說明本文研究的動機、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劉師培倫理思想之基本概念。本章論述劉師培對倫理基本範疇的看法，旨在說明劉師培倫理思想的內容，實由其基本概念推演而來。

第三章：劉師培之己身倫理論。中國傳統社會重視個人修身，強調克己復禮。本章論述劉師培在己身倫理方面的見解。

第四章：劉師培之家族倫理論。家族倫理在中國特別發達，但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本章論述劉師培對家族倫理的針砭。

第五章：劉師培之社會倫理論。傳統倫理思想，在社會倫理方面著墨較少。本章論述劉師培對社會倫理藍圖的勾勒。

第六章：結論。本章總結全文的論述，並敘述全文研究的結果與心得。



# 目

#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劉師培之生平及其治學傾向	2
一、劉師培之生平傳略	2
二、劉師培之治學傾向	7
第二節 學界研究劉師培之成果概述	9
一、對劉師培其人之研究	9
二、對劉師培其書之研究	11
三、對劉師培其學之研究	12
第三節 研究動機、範圍與方法	16
一、研究動機	16
二、研究範圍	17
三、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劉師培倫理思想之基本概念	19
第一節 對理的認識	19
一、「理」字的含義	21
二、對前儒言理的批評	22
第二節 對性、情、志、意、欲的認識	22
一、性、情、志、意、欲的關係	23
二、性、情、志、意、欲的內涵	24
三、性、情、志、意、欲的善惡屬性	26
第三節 對心與才的認識	27
一、心能覺能思慮	28
二、才有優劣之分而無善惡之別	29
第四節 對道與德的認識	30
一、道變動不居	31
二、德人已交利	32
第五節 對仁惠恕的認識	33
一、仁以實踐爲本	34
二、仁、惠、恕的關係	35
第六節 對義的認識	36
一、義之本質	37
二、義利之辨	38
第七節 對禮的認識	40
一、禮之本質	41
二、秉禮處世	43
第三章 劉師培之己身倫理論	45
第一節 修身爲實踐倫理之基	46

一、修身之重要	46
二、個人之義務	48
第二節 修身之形成及判準	56
一、修身之形成	56
二、修身之判準	61
第四章 劉師培之家族倫理論	69
第一節 父子倫理	71
一、慈孝爲父子互盡之倫	71
二、對父子之倫的批判	74
第二節 兄弟倫理	77
一、悌道爲兄弟共盡之倫	77
二、對兄弟之倫的批判	79
第三節 夫婦倫理	80
一、夫婦之際關係對等	80
二、對夫婦之倫的批判	83
第四節 宗族戚黨倫理	85
一、關於宗族倫理	85
二、關於戚黨倫理	87
第五節 奴僕倫理	88
一、革除奴僕之制	88
二、合理善遇奴僕	89
第五章 劉師培之社會倫理論	91
第一節 社會倫理在中國	91
一、社會倫理之起源	91
二、中國社會倫理不發達之原因	92
三、建立完全之社會	96
第二節 師友倫理	97
一、尊 師	97
二、信 友	98
第三節 鄉黨倫理	100
一、相親相濟	100
二、恭敬桑梓	101
第六章 結 論	103
參考書目	107
附 錄	
附錄一：劉師培世系圖	115
附錄二：劉師培年表	116

# 第一章 緒 論

晚清〔註1〕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註2〕，當此之時列強攘奪時局動盪，內憂外患交相煎逼，穩定沈滯的農業社會與經濟結構逐漸崩解，傳統的思想文化，也面臨空前的挑戰。中國在延續了兩千年的帝制及以儒家為主導的社會中，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的結構〔註3〕，因此以往的知識分子，可以負載著世代相傳的經世情懷，憑藉著古已有之的經驗與範式，去應對時勢、安排人生，然而晚清之巨變，已遠非此所能解決。生存在此變局中的有志之士，一方面思索著中國生存富強之路，一方面又深刻的反省著傳統文化的定位，劉師培即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個人物。他雖身負三代傳經的淵源家學，又為清代揚州學派的殿軍〔註4〕，晚清國粹學派的中堅〔註5〕，然其卻兼採西

〔註1〕 晚清一般係指鴉片戰爭爆發至辛亥革命成功（1840~1911）。張灝在〈晚清思想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則說：「1895年以前，士紳階級大多數仍生活在傳統思想裡，當時大儒如朱次琦、陳澧、俞樾、黃以周等人之著作中，幾乎見不到西學的蹤影」，但在甲午戰爭（1894）後，「思想上的變化不但是量的，而且是質的。」（《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民國67年6月）故其認為甲午戰爭才是晚清真正的交界關口。然而西學在鴉片戰爭之後，雖然並未立即威脅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底蘊，但此戰爭卻敲開了中國長期深鎖的大門，使得中國士人更深入的思考中國學術的特質，及如何調整之以因應時代的需求。因此，個人以為晚清之時代斷限，仍應上溯至鴉片戰爭，而下迄辛亥革命。

〔註2〕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卷二十四，頁11。

〔註3〕 孫隆基認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具有靜態「目的」意向性，整個歷史發展過程，呈現出一種「超穩定體系」的型態。見氏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頁8~10。

〔註4〕 揚州學派肇端於乾嘉之際。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將揚州之漢學學人集中編排在卷七，計有：陳厚耀、程晉芳、賈田祖、李惇、江德量、汪中、



學，並未自限於傳統之中，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本論文以「劉師培之倫理思想研究」為題，欲藉由劉師培對傳統倫理思想的反省，觀察作為傳統文化核心的倫理思想，在東西碰撞、新舊交替之際，究竟有沒有出路？又該如何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在未進入主題的討論之前，基於「知人論世」的原則，我們首先須對劉師培之生平及其治學傾向有所了解；其次，在學術分工日益精細的現代，無視於他人的研究成果，必定事倍功半，是以有關前人研究劉師培的成果，我們亦不可不知；再則，一個問題之所以會被提出，必定有其作（著）者的用意，因而有關論文之研究動機實有說明之必要；又，任何研究都必須界定其資料範圍，且運用有效相應的操作方法，職是之故，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我們也有必要對其加以說明。以下即就劉師培之生平及其治學傾向、學界研究劉師培之成果概述、本文研究動機、範圍與方法，三個方面加以述說。

## 第一節 劉師培之生平及其治學傾向

### 一、劉師培之生平傳略

劉師培，字申叔，號左龔，又名光漢，一度改名金少甫，另有韋裔、世

顧九芑、顧鳳毛、劉台拱、鍾襄、徐復、汪光曦、李鍾泗、凌廷堪凡十四人。道咸間，阮元以古學居顯位，風聲所樹，揚州學者名家輩出。劉壽曾《傳雅堂文集》卷一〈滙宮夜集記〉認為其家學乃江永之學的四傳，並謂揚州之學雖出於徽學，但「由專以趨於通核，廓然有以見學術之公，斯又王、汪、焦、阮諸家不同於江、戴之趣也。」（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516）劉師培亦說，從汪中至其先祖，揚州學派係屬皖派嫡系。（參見氏撰〈戴震傳〉，《國粹學報》第二年第二期）而近人張舜徽研究揚州學派，則明言指出劉師培自幼以紹述先業，昌大學派自任，「是清末揚州學派的殿軍」。（見氏著《清代揚州學記》，頁16）

〔註5〕晚清「國粹」說盛行一時，主張保存國粹者比比皆是，然非持此論者皆得冠以「國粹派」之名。所謂國粹派，學界歷來用以專指革命派內部，以章太炎、劉師培、鄧實為代表力主國粹的一派人。鄭師渠曾對國粹派作如下界定：「國粹派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個派別。他們都是一些具有傳統學術根柢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主張從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汲取精靈，以增強排滿革命宣傳的魅力，而且強調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國政治的同時，必須立足於復興中國固有文化。所以他們一身兩任：既是激烈的排滿革命派，又是熱衷於重新整理和研究傳統學術、推動其近代化著名的國學大家。」見氏著《國粹、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頁7~9。

培、光漢子、無畏、激烈派第一人等筆名，江蘇儀徵人。清光緒十年甲申（1884）閏五月二日（陽曆六月二十四日）生，民國八年己未（1919）九月二十八日（陽曆十一月二十日）卒，享年三十六歲。

他出生於一個三世傳經的書香世家。曾祖父劉文淇（1789～1854），字孟瞻，少時家貧。舅氏凌曙（1775～1829）憐其穎悟，自課之。文淇年未及壯，即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之間。凌曙終其身以校書授讀為事，文淇年甫十八，亦開門課徒，且教且學，以至於大成，與寶應劉寶楠（1791～1855）齊名，有揚州二劉之目。文淇精研古籍，貫串群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諸學說，博覽冥搜，實事求是，於《春秋左氏傳》致力尤勤。其治左氏之學，一在理董舊注，一在尋繹舊疏，而於道光八年（1828）有《左傳舊注疏考正》的刊行，然其《左傳舊注疏證》則僅完成一卷，即辭世而去，成為有待其子若孫，繼志述事的大業。文淇一生遊幕四方，助人編書、校書，並曾為阮元（1753～1849）聘為教席。他除了有《左傳舊疏考正》八卷、《左傳舊注疏證》一卷之著述外，尚有《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揚州水道記》四卷、圖一卷、《讀書隨筆》二十四卷、《青溪書屋文集》十一卷、《青溪書屋詩集》一卷、《項羽都江都考》一卷等著作傳於世，並主編過《鎮江志》。

祖父劉毓崧（1818～1867），字伯山，又字松崖。自少即從其父文淇遊客四方，助之校書。曾居曾國藩（1811～1872）幕府，任事金陵書局，校堪《王船山遺書》最勤，又嘗為杜文瀾纂輯《古謠諺》，有功藝林。毓崧治學，博及四部，嘗依其父文淇考證《左傳舊疏》之例，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各一卷，另有《春秋左氏傳大義》二卷、《史乘通義》四卷、《諸子通義》十卷、《王船山年譜》二卷、《彭城獻徵錄》十卷、《舊德錄》一卷、《通藝堂筆記》十六卷、《通藝堂文集》十六卷、《通藝堂詩集》一卷等著作，率皆博綜載籍，旁究根要，表微闡幽，剖析精微，然其對《左傳舊疏長編》的整理，卻仍未能完成。

毓崧有子四人，即劉壽曾（1838～1882）、劉貴曾（1845～1899）、劉富曾（1847～1928）、劉顯曾（1851～1928），其中以劉壽曾最有名。劉壽曾是劉師培的伯父，字恭甫，又字芝雲，少工文章，通小學。其父毓崧旅食於外，而壽曾隨行，嘗助之為杜文瀾纂輯古謠諺及詞學諸書，每日檢書盈尺，朱墨雜盡，由是泛濫群籍，而所學益博。毓崧晚年主金陵書局，為名公卿所禮重。毓崧卒，曾國藩父子重壽曾學行，復招其至書局，凡所刊善本，多出

其手校。壽曾根柢經學，旁涉四部，著有《昏禮重別論駁議》一卷、《臨川答問》一卷、《南史校議集評》、《傳雅堂集》、《芝雲雜記》、《文譜類釋》、《讀左札記》、《春秋五十凡例表》。而於其祖父文淇晚年所致力的《左傳舊疏長編》，則嚴立課程，銳志掣纂，惜疏稿屬至「襄公四年」，壽曾又卒，千秋大業，仍虧一篑，論者惜之。學界所謂儀徵劉氏三世傳經，即指文淇、毓崧、壽曾也。

劉師培父劉貴曾，字良甫，生而聰敏，曾助其父兄爲文事，於曆學用功特深，以通三統、四分之術而名聞東南。叔父富曾，字謙甫；顯曾，字誠甫，二人皆以學識通博、處世勤懇知名，不違其兄弟分別以「恭」、「良」、「謙」、「誠」爲字的重德立意。而劉師培一輩堂兄弟四人：劉師蒼，字張侯；劉師慎，字許仲；劉師培，字申叔；劉師穎，字容季，其名字中都分別鑲嵌著一個漢代經師之名，此正顯示這一經學世家，對於其子弟的殷殷期許。

劉師培承三代傳經之緒，加以外祖父李祖望（1814～1881），又爲當時的小學家，於《說文》、古韻皆頗有心得（註6）；母親李汝諤（1842～1919）也通曉經史詩文，故劉師培從童蒙起，便受經典浸漬薰染。年四歲，母親李夫人授以《毛詩》，即能琅琅上口，解釋《爾雅》、《說文》字義，亦能無一訛誤。五歲，爲人寫春聯，能作擊窠大字，時有神童之譽。八歲，已習得《周易》變卦之法。十二歲，讀畢《四書》、《五經》、內典道藏，旁及東西哲學，又習爲試帖詩，曾作〈水仙花賦〉及〈鳳仙花詩〉百首，時人目爲奇童。十六歲，父貴曾卒，雖家貧不能自給，然學則益勤。十八歲，參加揚州府試，得中秀才，補縣學生員。十九歲，赴南京應鄉試，高中舉人。惜於次年赴開封會試，卻未能及第。

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師培二十歲，赴開封會試不第，歸途滯上海，結識章太炎（1869～1936）、蔡元培（1868～1940）、鄒容（1885～1905）、張繼（1882～1947）、陳獨秀（1880～1942）、蘇曼殊（1884～1918）等愛國學社革命志士（註7），遂傾心革命，從此既站上政治舞台，也活躍於學術舞台。

（註6）李祖望，字賓岫，江都人。曾從梅植之（1794～1843）學《楚辭》、《文選》，又與同邑劉毓崧等人遊，著有《說文統系表》、《古韻旁證》。其傳見閔爾昌《碑傳集補》卷四十一。

（註7）愛國學社本是中國教育學會應南洋公學裡，因抗議校方壓制言論自由而退學的學生之請求，所設立的一所學校。總理由中國教育會會長蔡元培兼任，學監爲吳稚暉，教員有黃炎培、章太炎、蔣維喬等人。

是年，是劉師培生命史上一個極大的轉折：第一、他從傳統參與舉業的學子，一轉而為激烈排滿的革命分子。他改名「光漢」，立誓要「攘除清廷、光復漢族」，他撰寫《攘書》，闡發「類族辨物」和「春秋內夏外夷」之義，倡言排滿復漢，風靡一時；他撰《中國民約精義》，通過大量材料的羅列，信而有徵的描繪出中國古代民權思想的側影，使得他博得了「東亞一盧騷」的雅號〔註8〕；他撰《黃帝紀年論》，認為「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揚漢民族之感覺」，主張用黃帝紀年，公然稱清政府為「北敵」。第二、他由上海返鄉與何班結婚。何班，江蘇儀徵人，為武進縣學教諭何承霖次女，其兄何家輅為劉師培叔父劉富曾的女婿。何班思想前衛，後改名震〔註9〕，字志劍，又為示男女平等，將姓氏改為父母兩姓，自署何殷震。其在愛國女校就讀時，極為活躍，曾以俄國虛無黨員蘇菲亞（Sophia Perovskaya 1854~1881）自許，傾向暗殺主義；又頗富艷名，一度與汪公權「形同夫婦，宣言公夫公婦不諱」〔註10〕，劉師培生性懼內，而又憎急近利，其後背離革命，變節賣友，或多或少都受有何班的影響。

光緒三十四年（1908），劉師培二十五歲，這一年又是劉師培生命中的另一個轉捩點。是年，其主辦的《天義報》及《衡報》相繼被查封，又與同盟會革命黨人發生齟齬不睦之事。十一月，劉師培與何班由日本歸國，向清政府兩江總督端方（1861~1911）投誠，也結束了他一生的革命事業。在獻身革命的六年期間，二十歲到二十三歲，他在上海、蕪湖等地，無論是為報刊編輯或撰稿，或是擔任學校教職工作，都與革命團體人士有所交往，除了以文字宣揚反滿的民族情緒外，更參加了刺殺有聯俄之舉的清政府官員王之春的暗殺活動。他除了「用古文，以保存國粹」，為《國粹學報》撰稿，試圖用存學以保種救國，亦不忘「修俗諺，以啓淪齊民」〔註11〕，為《中國白話報》撰稿，藉淺近通俗的白話文，來教育民眾，啓迪民智。二十四到二十五歲，他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又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衡報》，以文字、演講宣傳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思想，在這段時間裡，他的行事表現，的確如其筆名，是個無所顧忌的「激烈派第一人」。

〔註8〕 棟臣〈題國粹學報上劉光漢同志諸子〉，見《國粹學報》第十六期。

〔註9〕 何班在1907年改名何震。

〔註10〕 見馮自由〈記劉光漢變節始末〉，《革命逸史》第二集，頁228。

〔註11〕 劉師培〈論文雜記〉，《國粹學報》第一期。

背離革命以後的劉師培，二十六到三十歲，他由上海、南京、天津、成都而至太原。他依附權貴，破壞革命活動。先是至南京入端方幕，建議端方設立「兩江存古學堂」，以培訓「國學教員」〔註12〕；又隨端方至天津。宣統三年（1911），劉師培二十八歲，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等地，相繼發生保路運動，他又隨端方到成都鎮壓，適武昌已宣布起義，端方被殺於資州，劉師培亦被資州革命軍政署拘禁。後幸得章太炎、蔡元培二人營救，始得獲釋。劉氏入幕端方的這段時期，既遭殤女之痛〔註13〕，又有見居之厄，其事之不順，可見一斑。獲釋後的劉師培並未回到上海，他先應謝无量（1885～1964）之邀，至成都國學院講學，並為《四川國學雜誌》撰稿，且有機會與蜀中今文大師廖平（1852～1932）建立學術友誼。民國二年（1913），劉師培三十歲，又由成都至上海轉赴山西太原，任山西都督閻錫山（1883～1960）高等顧問，並創辦《國學鈎沉》。隨後，因閻錫山之薦，到北京任袁世凱（1859～1916）參政，迷戀於名利權勢的追逐之中。

民國三年（1914）到五年（1916），劉師培三十一歲到三十三歲，他在北京，重組《中國學報》，又加入籌安會，發表〈君政復古論〉、〈告同盟會諸同志書〉、〈國情論〉等文，附和袁世凱恢復帝制。袁世凱死，他逃匿到天津租界，幸經內閣總理李經羲（1860～1923）基於「人才難得」的考量，始取消通緝，但也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民國六年（1917）到八年（1919），劉師培三十四歲到三十六歲，這是他生命最後的三年。時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劉師培受聘擔任文科教授，然此時其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讀，但他所編講義《中古文學史》卻甚受學生歡迎。在北大講學的這三年期間，他仍繼續其維護國粹的主張，為《國故月刊》主編，與宣傳新文化的「新青年雜誌」對抗。民國八年（1919）十一月，他終以「一生當論學而不宜論政」的醒悟，結束了他多變而又具爭議的一生。因其身後無子，故叔父顯曾以其孫葆楹承其香火，蔡元培為之經紀其喪，次年二月，由弟子劉文典奉棺回揚州，歸葬於祖塋之原。而其夫人何震，則精神病發作，後削髮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終。

〔註12〕 劉師培〈上端方書〉，《左盦外集》卷十六，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下），頁1729。（以下凡引此書，皆簡稱《遺書》）

〔註13〕 宣統二年（1910）春，何震生下一女，取名穎，只活七十六天即夭折。劉師培《左盦外集》卷十六，有〈女穎塘銘〉，《左盦詩錄》卷三、《左盦詩錄續》有〈傷女穎〉五古二首。

## 二、劉師培之治學傾向

劉師培天生岐嶷，賦質睿敏，既勤於治學，又熱衷於政治〔註14〕。他不僅稟受三世傳經家學淵源的薰陶濡染，嚮慕著揚州鄉賢漢宋兼採、弘通博大的治學格局，且能掌握時代脈動，留心西方新知，熟諳西方社會學〔註15〕，在學術上並不一味守舊泥古。他善於分析，長於綜合，在古今學術思想、經學史、民族史、姓氏學、文字學等領域，均可見其的開拓之跡，而其理董群籍、推見古書大例，更可見其用力之深。在治學上，他有時像一個思想敏銳的新時代探索者，有時又像一個懷舊保守的舊時代固守者。這種看似相悖不容的雙重學術現象，其實與他激烈偏執的生命氣質，有密切的關係，而且也受其政治立場轉變的制約。

晚清是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斯時，西風東漸、物競天擇、合群進化的思想，在中國社會不斷迅速的播演流傳。「考古而不能知今，則為無用之學」〔註16〕，學術必須與社會現實結合，也逐漸成為時勢之所趨的呼聲。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劉師培獻身革命的期間，他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公例為論點，發表了大量的著述，闡述民族革命。如其於《中國民族志》中，就闢有「白種之入侵」專章，提醒國人「瓜分慘禍，懸於眉睫」，中華民族若不思奮起，則將有滅種之危。其目的即在喚醒國人對民族危亡的關注，以求生存。又其在《倫理教科書》中，指出：「倫理者，所以維繫人群而使人類常存也。」並從「人訓為仁，仁從二人」的文字訓詁，證明人類能合群，故能競勝萬物〔註17〕。他關注倫理思想的改革，希望能「振勵國民之精神，使之奮發興起」〔註18〕。而在提倡民族革命的同時，又有《中國民約精義》、《兩漢學術發微》、《讀左札記》等闡述民主思想

〔註14〕 尹炎武〈劉師培外傳〉說他：「雖淵靜好書，而心實內熱。」文收《遺書》卷首，頁17。

〔註15〕 光緒二十年（1900）庚子義和團之亂後，接受西學才能救亡圖存，已成為當時士人普遍的共識。劉師培雖未曾上過新學堂，但他以閱讀新式書報的自學方式，吸取了不少西學新知。他在〈擬設國粹學堂啓〉中說：「凡國學微言奧義，均可借晰種之學，參互考證，以觀會通。」（見《國粹學報》第三年第二期）又其〈甲辰自述詩〉自注：「予于西方社會學研究最深。」（收李妙根編《劉師培論學論政》，頁553）

〔註16〕 劉師培〈爾雅蟲名今釋〉，《國粹學報》第二十九期。

〔註17〕 見《倫理教科書》第一冊第四課「倫理與人類之關係」，收《遺書》（下），頁2027。

〔註18〕 見《倫理教科書·序例》，收入《遺書》（下），頁2025。

的論著。學求世用，是劉師培此一時期十分明顯的治學傾向。

在學術立場上，劉師培於獻身革命時期，始則容忍今古文的爭議分歧，如其所撰《讀左札記》、《兩漢學術發微》、《群經大義相通論》都強調今古文互補，並認為非難公羊家言，實匪夷所思。但光緒三十二年（1906）九月以後，他所發表的論著，若《論孔子無改制之事》、《漢代古文學術辨誣》、《近代文學的變遷》、《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等，全都是昌大古文而駁詰今文經學之言，考其原因除了其古文經學的家學執著外，更有著欲打破康、梁立憲的經學根據，以順應排滿革命的現實需求。

在對西學的態度上，他清楚的意識到傳統學術有遜於西學之處，「中國科學不興，故哲學與工藝無進步」〔註 19〕，故其在主撰《中國白話報》時，就闢有「文明介紹」、「科學」等專欄，介紹西學新知。而在傳統學術的復興上，其所謂「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也並非一味的崇古戀舊、抗拒西學，而是欲「借晰種之學，參互考驗，以觀會通」，使得國學的微言奧義，更易為普羅大眾了解，期能「思想日新，民智日濬」〔註 20〕。換言之，劉氏所著眼的乃是一種文化的創新。

劉師培資質穎秀，而又少懷大志。他志在光大先學、扶持傾世〔註 21〕。常自比幽蘭，然而「幽蘭閔隨谷，莖葉隨春發」卻「不見美人采，坐歎貞蕤歇」；更自期作鴻鵠，然而卻「出門何茫茫，俯仰天地窄」，「流光不我待，白日忽已夕」〔註 22〕。他急於表現，但又生怕時不我予，更擔心無人賞識。由於理想太高，現實環境未必盡如人意，在許多主觀願望受到挫折，諸事不順之際〔註 23〕，他終於背離革命，投靠端方。而在此之後，他的治學傾向也有了明顯的改變。民國前，他致力於古籍的考釋，如《荀子補釋》、《琴操補釋》、《古曆管窺》、《白虎通義源流考》、《白虎通義駁補》、《周書補正》、《周書略說》、《管子駁補》、《楚辭考異》等，都是此時的力作。民國後，他更與新文化運動脫鉤，努力的把自己打扮成經學大師的模樣，嘔心瀝血於《尚書》、《毛詩》、《周禮》、《春秋左氏傳》等古文經典的舊注集疏。其間雖見「尋

〔註 19〕 劉師培〈孔學真論〉，《國粹學報》第十七期。

〔註 20〕 劉師培〈擬設國粹學堂啓〉，《國粹學報》第十四期。

〔註 21〕 劉師培〈甲辰年自述詩〉有謂：「大廈將傾一木支，乾坤正氣賴扶持；試從故國稽文獻，異代精靈黨在茲。」（收入李妙根前揭書，頁 551）

〔註 22〕 參見陳燕〈劉師培其人其事〉，《中山大學學報》第三期，1986 年 6 月。

〔註 23〕 如：與章太炎發生齟齬，《天義報》、《衡報》相繼被封。

究古說，摭拾舊聞」，證之以實的札實學力，但卻缺乏「深思獨造，貴有新義」，運之以虛的通核之象。由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劉師培治學傾向的轉變軌跡。

## 第二節 學界研究劉師培之成果概述

### 一、對劉師培其人之研究

學界有關劉師培其人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

#### （一）出於親朋好友和學生之手者

這類作品，多撰於劉師培去世不久後。如：錢玄同〈左龔年表〉、陳鍾凡〈劉先生行述〉、劉富曾〈亡侄師培墓誌銘〉、尹炎武〈劉師培外傳〉、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章炳麟〈關於劉申叔君之文八首〉、黃侃〈關於劉申叔君之文二首〉，這些作品今皆收於民國二十五年寧武南氏校印本《劉申叔先生遺書》內。由於作者與傳主有實際的交往，因而留下了許多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是後人了解劉師培其人，十分珍貴的材料。但也由於作者與傳主之間，特殊的關係與交誼，所以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摻雜了個人情感的成分，而在言詞上對傳主有所迴護或閃爍。如：劉富曾在〈亡侄師培墓誌銘〉中說：「侄材瑰奇，少年氣盛，思欲有以自見，然名之所至，謗亦隨之。」〔註 24〕迴護之意就極為明顯。又，劉師培以革命黨人之身份，投靠端方一事，蔡元培於〈劉君申叔事略〉中則說是因「君忽與炳麟齟齬，有小人乘間運動何震，劫持君為端方用」〔註 25〕，亦有意為劉氏辯解。此類問題，都有賴後人於閱讀時深思明辨。

#### （二）出於與劉氏相識然無私交者

這類作品較著名者，有：馮自由《革命逸史》中所收之〈記劉光漢變節始末〉、〈劉光漢事略補述〉等文。此類作品，作者雖與傳主相識，但並無私交，加上政治立場相左，是以對劉氏較缺乏同情的理解。如：馮自由於〈劉光漢變節始末〉中說：「光漢心銜所提議改組同盟會攘奪幹部職權之策不成，漸有異志。……是時清吏肅王善耆、錢良、端方等鑒於徐錫麟之暗殺，咸有

〔註 24〕 見《遺書》卷首，頁 16。

〔註 25〕 同註 24，頁 18。



戒心。各自設法向黨人施展金錢政策，使爲己用。……適光漢因事與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大起衝突，又以勾結日人奪謀黨權事不理人口，何汪等乘之日夜慫恿光漢使入官場，以圖報復。」〔註 26〕用語十分嚴厲。且對劉師培在政治立場上反覆多變的行爲，深表不以為然，其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劉光漢一之而再，殆揚雄、華歆之流亞歟！」〔註 27〕又言：「說者謂其晚節披猖，由於貧病所致，其然豈其然乎。」〔註 28〕批判之意躍然紙上。此皆吾人在使用此類資料時，須特別留意的。

### （三）出於一般學者所作

這類作品大致出於知人論世的學術需要而作，或綜述通論劉師培其人，如：王森然的〈劉師培評傳〉〔註 29〕、李漁叔的〈劉師培別記〉〔註 30〕、陳燕的〈劉師培其人其事〉〔註 31〕、方光華的《劉師培評傳》〔註 32〕、徐虹主編的《北大四才子》〔註 33〕。或專就某一特定事件論述劉師培其人，如：經盛鴻的〈劉師培與黃侃交往二三事〉〔註 34〕、鄭師渠的〈章太炎與劉師培交誼論〉〔註 35〕、陳師慶煌的〈章太炎與劉師培——記章氏顧全友倫營救讀書種子的一段經過〉〔註 36〕、李洪岩的〈劉師培背叛革命公案述說〉〔註 37〕。此類作品，大抵所論都在劉師培政治立場的搖擺不定，及其於友倫有虧的爭議問題上。此外，尚有一些非特意爲劉氏作傳的著作，亦涉及到劉師培其人，像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註 38〕、楊天石的〈章太炎與端方考析〉〔註 39〕等，也都可以補充我們對劉師培的認識。

〔註 26〕 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 232。

〔註 27〕 同註 26，頁 233。

〔註 28〕 同註 26，冊三，頁 192。

〔註 29〕 王森然〈劉師培評傳〉，《國風半月刊》第四卷第九期，1934年5月1日。

〔註 30〕 文收氏著《魚千里齋隨筆》，台北：中華書局，1970年，頁 21~24。

〔註 31〕 同註 21。

〔註 32〕 方光華《劉師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

〔註 33〕 徐虹主編《北大四才子》，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註 34〕 經盛鴻〈劉師培與黃侃交往二三事〉，《文教資料》第一期，1990年。

〔註 35〕 鄭師渠〈章太炎與劉師培交誼論〉，《近代史研究》第七十八期，1993年11月。

〔註 36〕 文收入《章太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

〔註 37〕 李洪岩〈劉師培背叛革命公案述說〉，《文史知識》第十一期，2000年。

〔註 38〕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

〔註 39〕 文收入《尋求歷史的謎底》（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 181~